



百年殷夫研究丛书

[俄]H. Ф. 马特科夫 著
宋绍香 译

殷夫 —
中国革命的歌手

YINFU ZHONGGUO GEMING DE GESHOU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

[俄]H·Φ·马特科夫 著 宋绍香 译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翻译)

印 行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排 版	宁波六合印业有限公司
承 印	宁波六合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开
字 数	90 千
印 数	700 册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准印证号	浙内图准字[2011]甬 09 号

来自异国殷夫研究的启示

——读《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全译本

王庆祥

(一)

记得 1980 年秋季，就听说苏联汉学家 Н·Ф·马特科夫早在 1962 年写过《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一书，还听说此书引用了《殷夫日记》。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当时我正在多方查找解放初才从象山散佚的《殷夫日记》，但始终不见踪影。于是，通过上海一位朋友，几经周折从一位曾经留学苏联的老学者那里复印了这部俄文原著的前头部分，遂请一位回乡度假的华东师范大学俄语讲师翻译这些复印件。不几天，译稿出来了，但所能读到的仅是该书的《目录》、《前言》和第一、第二章，根本找不到《殷夫日记》的引文。不过，从这些译稿中，我却意识到，马氏此著应当是当年苏联文学评论界第一部全面论述殷夫诗歌及散文、政论文创作的学术专著。所以，后来又去信上海，请那位朋友再设法复印其他各章。不料，留苏老学者去世了，只得作罢。

1983年4月，上海丁景唐唐先生来象山搜集殷夫史料，我向他问起马氏此著。他说了1961年前后接待马氏到访的经过，又说了马氏当年与瞿光熙先生的交往，以及瞿先生“文革”中因此被打成“苏修特务”并含冤而死的“奇闻”。丁先生还告诉我，他也未曾见过马氏此著，因为国内还没有出过译本。所以，我也只好放弃了再去追寻的念头。

时隔27年，2010年6月11日是殷夫百年诞辰。象山县以“百年殷夫：新感悟、新解读”为主题，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活动刚结束，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共象山县委宣传部接到了山东泰山学院老教授宋绍香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手头有一部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俄文版原著，准备翻译成中文，希望得到象山方面支持。宣传部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喜出望外，也勾起了从前的种种记忆，当即表示赞成。

不久，宋先生也给我打来电话，并寄来由他翻译的[俄]Л·Е·切尔卡斯基所著《艾青：太阳的使者》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从该书《译者简介》中，可知宋先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曾历任泰安教育学院（今泰山学院）外语系主任、学报《岱宗学刊》主编等职，著译颇丰，是一位知名作家和翻译家。此后，我们多次通电话就马氏此著的翻译事宜交换意见。我则热切地盼望宋先生的全译本能快点出来。

(二)

差不多盼望了三个月时间,宋先生终于寄来了马氏原著全书的中译本。捧着这 8 万余言的译本,我很快通读了全文。虽然手头无原著可校对,但我却对于宋先生老到畅达的译笔,感到十分钦佩。同时,这部俄文原著所引的殷夫诗章,宋先生基本采用了由我所编的《殷夫遗诗校注》文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6 月出版),读来更觉得亲切。

通读中,我终于读到了期望已久的《殷夫日记》引文三则。诚然这三则引文,一则引自殷夫 1928 年 8 月(未注日期)所记,另两则引自 1930 年所记(均未注月、日),内容也都不涉及殷夫当时行踪,但我却以为,它足可证明殷夫生前确有《日记》传世。由此,也可印证我 1980 年前后查找《殷夫日记》是事出有据的。因为当年有些知情人都说到,殷夫牺牲时,他的二姐徐素韵正在上海。得悉噩耗后,她立即冒着风险前往闸北殷夫住处,收集了弟弟的不少遗物,装在一只铁皮箱子内运回象山丹城家中珍藏,其中就有《殷夫日记》多本。抗战中期,丹城沦陷,徐素韵还将这箱殷夫遗物转移至乡下,一直保管到 1949 年 7 月丹城解放。只是到了 1950 年 12 月,徐素韵被“错杀”,才不知去向。现在,时过 60 年,《殷夫日记》居然“出国转内销”,这又让我重新激起了查找它的下落的欲望。

细读这部译本各章,我还发觉,马氏所论不仅是殷夫的

诗歌创作，而是涉及殷夫的全部文学与非文学创作实践，一如马氏在《前言》中所云：“殷夫是中国杰出的诗人、作家、政论家和翻译家”。为此，他先以第一、第二章，分别阐述了殷夫生活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文艺战线的复杂背景。又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分别论述了殷夫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接着，则以第七、第八章，分别论述了殷夫的小说、散文（包括速写、随笔、笔记、书信等）、剧本以及政论文创作和有关文学与非文学翻译作品。最后，才以第九章“殷夫的壮烈牺牲”作结。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马氏在第七、第八章中以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向我们揭示了殷夫作为杰出的作家、政论家和翻译家的真实面貌。他在第七章一开头便指出：

“殷夫不仅以诗人而著名，他还写了一百多篇小说、抨击性散文、随笔、剧本。很遗憾，其中很多作品没有保留下来。在这些作品中殷夫竭力描写了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殷夫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剧本，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品中运用了许多真实的素材。”

在第八章中又指出：

“殷夫，作为政论文作家的活动，在中国文学评论界至今还没有得到评论。从1929年末到1930年1月，这一时期，殷夫撰写了二百多篇关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论文。殷夫在地下刊物发表这些论文，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笔名；……”

文中，马氏还论及殷夫的翻译作品，说殷夫懂英文、德

文,后来又学了五个月俄文,结果竟能进行翻译,不仅翻译列宁的文章和著作,还想翻译裴多菲、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因此,马氏称赞殷夫是“一位具有很高政治水平的职业革命家”。

必须明白,Н·Ф·马特科夫这些论述并非无的放矢。据宋绍香先生查考,马氏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副教授期间,就专注于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研究,1955年、1959年曾发表关于胡也频、殷夫和柔石的论文。1960年前后,他奉派来华进修。当时中苏关系已日趋紧张,他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革命历史博物以及鲁迅纪念馆查证殷夫生平史料和遗诗、遗文、日记等等,收集有关殷夫研究的文章和资料,并访问过多位殷夫研究专家(包括丁景唐、瞿光熙等先生)。据说,他还曾到过象山,访问过殷夫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从而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国后,他才写成这部学术专著。虽然,他所言的殷夫散文、政论文的数量(包括第五章中所言的殷夫一生“创作了五百多首诗歌和几十部长诗”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核实,全书评诗论人的某些观点以及关于殷夫生平和有些诗作背景的叙述也有待进一步推敲,但是,他的治学之道和求真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称道和彰扬的。

联系我们国内,从1962年以来,号称“殷夫研究专家学者”的不乏其人,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更是不计其数。但

是,有多少人能像这位异国殷夫研究者那样,不远万里,访旧问故,占据第一手资料,然后著文立论的呢?据我所知,为数极少。一般的,都是从文中到文本,或者是人云亦云,甚而主观臆断,胡编乱撰,因此错误百出,不堪卒读。针对这种状况,再来体味马氏的治学之道和求真精神,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反思吗?

尤其应当引以反思的,是马氏第八章所指出的那句话:“殷夫,作为政论文作家,在中国文学评论界,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时间已经过去了48年,中国的文学评论界有没有对这个问题引起了重视呢?据我了解,几乎没有。48年来,我们国内研究殷夫,一直还停留在(或者说是局限于)他的诗歌创作上,很少评价他的小说、散文与剧本。特别是对他的政论文,几乎无人涉足。这是为什么?难道那是一个“禁区”?不对,48年来根本没有什么人说过不可研究殷夫的政论文。按理,任何一位作家,尤其是殷夫那样的革命作家,他的政论文应当是他的政治见解或主张的一种直白表述与抒发,比之于他的诗歌、小说、散文或者剧本,更能代表他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重大问题的立场与观点。因此,研究殷夫的政论文,可以说是探究殷夫革命生涯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却被人们所长期忽视了。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人云亦云”上,以为殷夫是鲁迅定评的“别一世界”的诗人,是学界公认的“现代革命诗人”,是社

会崇敬的“左联”烈士,因此只能作为“诗人”来做文章,囿于一域,不及其他。其实,这种“人云亦云”,说到底,还是由于文学评论界缺乏求真务实、独立创新精神所致。因为研究殷夫的政治论文,势必涉及当年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包括党内“路线斗争”,搞不好会有悖鲁迅的“定评”、学界的“公认”、社会的“崇敬”,甚而会有损殷夫的“光辉形象”。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殷夫,他的人格同样是多重的,立体的。他自己就曾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坦言:“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而厘清那条“曲线”,对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殷夫,乃是至关重要的。

(三)

如同宋绍香先生在本书《译者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代已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在这个时候再来读马氏 48 年前的此著,自然会有一种“隔代”之感。

首先,由于受当年苏联(包括中国)的政治观和艺术观的影响,作者在评诗论人的视角上太过强调艺术与政治的直接关系,而对殷夫诗歌丰富复杂的内涵则开掘得不够,与我们今天“新感悟,新解读”要求相去甚远。今年 6 月 11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等在象

山主办的“纪念殷夫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余所高校以及有关文化单位的 50 余名殷夫研究专家学者,集中围绕“百年殷夫:新感悟、新解读”这个主题,对殷夫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特别是透过审视左翼文本研究视角的调整,对殷夫诗歌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作出了深层次的开掘,显示出对以往研究的较大突破。主要有:1、对殷夫的生平事迹,有了更为翔实的发掘与考证,长期以来困扰着殷夫研究的史料方面的一些谬误与障碍得到了纠正与清理;2、不拘泥于由鲁迅和党史给定的历史结论,改变了长期以来定于一尊、囿于一域的研究格局,在学术层面上丰富了对殷夫及其诗歌的阐释与理解;3、一些新的阐释框架,如殷夫诗歌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与中国诗史的关系及其跨国界文化意义等,拓展了殷夫诗歌的意义与价值空间;4、殷夫的诗歌文本得到了更为细致和精微的解读,其美学内涵得到了更为充分与独到的把握(见《文学评论》2010 年第 5 期第 220 页)。这些,都是马氏此著所未能企及的。

其次,由于受当年中国文艺批评思想(主要是左倾思潮)的影响,作者在阐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文艺界那场“文学论战”时,未能把握分寸,言辞偏激。那场所谓的“论战”,现在来看,其实主要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论争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表现出某些意气用事的缺点(包括鲁迅)。论

争中,虽然也曾混杂一些不纯分子的推波助澜,但并非主流。通过论争,纠正编差,强调团结,客观上则为“左联”的成立作了思想、理论和组织的准备。同时,马氏在对当年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以及所谓“民族主义派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第三种人作家”的批判中,态度也太过极端。要知道,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自改革开放以来都已有了新的评价。因而,书中的许多说法,已显老旧,不合时宜了。

再次,还由于受当年殷夫史料的发掘与考证不足的影响,马氏在述及殷夫生平以及有关诗作背景时,也有未能合实之处。为此,有必要根据本人多年来的查考所得,择要作些订正与澄清(以译本中所见先后为序):

1、第三章开头称殷夫“原名徐柏庭”,又称他生于“1909年6月22日”。

事实是:殷夫本名徐孝杰,“徐柏庭”乃是其号。他的生辰是清宣统二年端午节(农历庚戌年五月初五日)辰时初刻,即公元1910年6月11日上午7时前后。而非“1909年6月22日”。

2、同章中称:“殷夫17岁时来到上海。他开始在民立中学读书,一年后进入浦东中学学习。”

事实是:殷夫于13周岁刚出头时,即1923年7月赴上海以学名“徐白”考取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一年级,9月入学,

在读三个学年,于1926年6月毕业。同年7月,又以“徐白”的学名越级考取上海浦东中学“高三级”(即高中第三册插班生),9月入学,在读一个半学期,至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期被捕入狱(即第一次入狱),从此离校。

3、同章中称:“1927年秋,殷夫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因为他被捕,中学没发给他毕业证,报考时只好再次求助于徐培根过关。”

事实是:殷夫于第一次被捕出狱后,曾想去苏联留学。后来在他大哥徐培根的劝说下,才于1927年8月决定报考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因为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所以通过他的女友盛淑真借得上虞人徐文雄的文凭才去报考。当时“德文补习课”第一次招生已经结束,他只得参加9月14日至15日第二次招生考试,于18日录取,19日即报名注册入读。因此,他在同济读书时学名就叫“徐文雄”。1928年9月编印的《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德文补习科第一年级”学生名录,又将他的籍贯记作“浙江上虞”。

4、同章中又称:殷夫于“1929年3月离开学校(指同济大学)”,他在大学里“学了不到两年(德语)”。

事实是:殷夫在同济大学只读了两个学期又一个多月德语。1928年7月,他因参加校外革命活动而第二次被捕入狱。后由在德国柏林陆军参谋大学留学的徐培根疏通关节,并以夫人张次云的名义保释出狱。9月中旬,学校开学,殷夫曾应

徐培根之要求重回同济读书,但当时校内外政治环境对他十分不利,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让他与“德文补习科”同学王顺芳、陈元达(均中共党员)一起离校“暂避”。因此,他们三人遂于1928年10月下旬离开同济,转移至象山由殷夫二姐徐素韵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以“代课”为名继续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年底,陈、王先后离象返沪,殷夫亦欲同往,只因他的大嫂张次云不给盘缠而无法成行。在家过了春节,殷夫才在二姐徐素韵的资助下,于1929年2月重返上海,过起了“短期流浪”生活。

5、第四章中称:殷夫在《呵,我爱的》一诗中“回忆了自己的初恋”。又称:《我们初次相见》一诗是写“殷夫初次与可爱的姑娘相见”。

事实是:《呵,我爱的》一诗中的“姑娘”,是写殷夫姑母之女林梅英(大徐村人)。她比殷夫年长1岁,是殷夫的表姐。他们两人从小在一起嬉戏,亲昵无邪。其时,林已18岁,聪明美丽,人见人爱,但不曾与殷夫“初恋”。《我们初次相见》一诗中的“你”,是写殷夫在同济“德文补习科”甲组同学王顺方,男,中共党员,上海浦东三林塘人。他1928年冬回上海后,先后在英商公共汽车公司、沪宁铁路、杭甬铁路进行革命活动。1934年被捕入狱,以“政治犯”监禁在南京“中央监狱”。1937年抗日爆发,国共合作,获释后曾赴延安。同年10月回上海浦东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后奉派至浙江余姚“中共浙东军分

委”工作,1945年5月在策动日伪“余姚保安团”反正时不幸牺牲。

6、第五章中称:“殷夫有三个哥哥:大哥徐培根,德国陆军参谋大学留学,官至陆军上将,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等职;二哥徐兰庭,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三哥徐文达是上海某造纸厂厂长。”

事实是:殷夫牺牲之前,徐培根尚在德国留学;徐兰庭还在老家大徐村务农;徐文达则在南京国民党军总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徐培根任航空署署长一职,则是殷夫牺牲两年后(即1933年)的事,当时的军衔也只有陆军少将。只是1949年去了台湾,于1952年升任“国防部次长”和“参谋总部副参谋总长”之后,才挂“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徐兰庭进入国民党军界,也是1935年的事。开头,他只是南京“军械司”下属“金陵库”的一名“库员”,实际是军械仓库保管员。后来,因为为人忠厚,手脚勤快,才挂“少尉”军衔。抗战期间,他才逐步晋升为湖南“第九战区职勤总部第四军械库”中校库长。抗战胜利,即辞归大徐。徐文达也在抗战初期调任“军械司”中校库长。抗战中期,在四川重庆任“军政部军械司”上校视察员。抗战胜利,转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军械处”上校处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即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移交库存军用物品1.2万吨,并参加三野军训第十团学习。受训结束,“迁散”回上海,于1950年7月安置上海大明造纸厂从事

后勤工作,并非厂长。

7、同章又称:“父亲去世时,殷夫才读小学二年级。”

事实是:殷夫的父亲徐孔甫(本名徐中庸,一作忠镛)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卒于民国9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即公元1920年1月28日)。其时,殷夫已11岁,正在家乡大徐初级小学就读初小四年级。同年9月考入象山县立高小,在读三年,至1923年6月高小毕业,由徐培根带往杭州。7月,转赴上海报考国立中学“新制初中”。

8、第六章中称:“诗人的母亲侥幸活到了愉快的胜利之日。她认识了她的儿子曾为之而忘我奋斗的新生活。”

事实是:殷夫的母亲钱玉嫦(一作月嫦)生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卒于民国30年(公元1941年)。这年春天,县城(丹城镇)沦陷前,徐素韵为躲避侵华日机轰炸,将她的“私立培本小学”师生300余人分作两部,转移到城西乡下“七里亭”一带继续上课。母亲钱玉嫦也由她带至附近黄溪村,流寓在一所古庵内。不意,于9月17日感染了疾患,客死异乡,享年72岁。当时,徐培根、徐兰庭、徐文达以及徐素韵的丈夫马静斋等均在外地参加抗日,家里只有徐素韵与二嫂陈素英(徐兰庭夫人)两个大人。她们将钱玉嫦灵柩运回老家大徐,简单地举行了治丧活动,便浮厝于自家“后园”。因此,钱玉嫦没有活到“愉快的胜利之日”,也就不可能“认识”殷夫为之奋斗的“新生活”。同时还必须说明,钱玉嫦去世前一直

不知殷夫已经牺牲，因为徐素韵等子女从不告诉她这件事，只对她说殷夫去了苏联莫斯科。所以，钱玉嫦临终时还叮嘱徐素韵：“阿白（殷夫的小名）的东西（指殷夫与三个哥哥分家时分得的房屋与产田），等他回来再交给他……”

9、同章中又称：殷夫于1929—1930年“主编秘密刊物《列宁青年》”。

事实是：《列宁青年》是当时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于1928年9月由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华少峰（华岗）筹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殷夫于1929年秋天进入团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主要从事青年运动工作，也为《列宁青年》写过一些政论文、诗歌、散文以及翻译文章。因为他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唯一的干事，所以也协助华编辑《列宁青年》。1930年夏天，华少峰调出团中央，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从事党的工作。其时，《列宁青年》主编暂缺，曾由殷夫代编一两期。不久（同年7月），陆定一从苏联回国，接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并兼任《列宁青年》主编，直到1931年1月王明集团上台为止。期间，殷夫可能也协助陆定一编辑过若干期《列宁青年》，但不是主编。不过，有关史料表明，殷夫在这一期间曾与人发起成立“摩登青年社”，并曾主编过《摩登青年》第2期。

10、第八章中称：“1930年3月，殷夫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事实是：殷夫因为是“太阳社”成员，在1930年3月2日

“左联”成立大会之前,他已参加“左联”筹建活动。因而,他是“以“发起人”的身份出席成立大会的。关于殷夫的入党时间,向来众说纷纭。我在1980年7月5日听殷夫县立高小读书时同班同学许福莹先生说到,他因为曾在1926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参与筹建国民党象山县党部,“4·12”反革命政变后期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后来长期躲避在外。1929年6月,他曾上海马路上偶然遇见殷夫,与殷夫说起组织问题。殷夫亲口对他说:“我是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时,由杨白和刘积铨介绍入的党。”杨白,象山丹城人,1926年由共青团转党,任中共象山独立支部书记。同年调上海中华海员工会任书记(化名杨广武),在浦东烂泥渡“小船工会”发动舢舨工人、黄包车夫参加工人武装起义。刘积铨,象山东乡夏雨岙人,是殷夫县立高小同学,并与殷夫、姜冰生(即后来的姜馥森)结为“拜盟兄弟”。刘后来在宁波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由团转党。同年底去上海日晖会计补习学校(址在金神父路,即今瑞金二路)补习会计课程。刘因与杨知交,1927年2月曾约同在浦东中学读书的殷夫,参与杨白的发动海员工人参加第二次武装起义活动。起义失败,杨、刘见殷夫表现积极,而且已18岁(虚岁),遂介绍其参加中国共产党。此事,后来因为杨于1929年12月病逝;刘脱党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航空署任职,抗战胜利不久病逝于四川成都,一直无人知道。但是,殷夫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第一章中